

# 從「新名詞」到「關鍵詞」 以「殖民地」為例的思考

著者	潘 光哲
journal or publication title	Intellectual Exchange in Modern East Asia: Rethinking Key Concepts
volume	44
page range	201-224
year	2013-11-29
URL	<a href="http://doi.org/10.15055/00002193">http://doi.org/10.15055/00002193</a>

# 從「新名詞」到「關鍵詞」——以「殖民地」為例的思考

潘光哲

## 一、前言

在廿世紀中國學術界裡廣受推崇（當然，也頗受批判）的錢穆（1895-1990），著作等身，擁有廣大的讀者群。例如他的《國史大綱》（1940年初版<sup>1</sup>），就是廣受推崇看重的一部書，被認為猶如史詩（epic）一闕，是以撰寫「國史」為中國國族「招魂」的名著<sup>2</sup>，也是他公開展現思想轉向於捍衛／贊揚所謂「中國文化」的里程碑<sup>3</sup>。即如錢穆的夫子自道：

余自《國史大綱》以前所為，乃屬歷史性論文，僅為古人伸冤，作不平鳴，如是而已。此後造論著書，多屬文化性，提倡復興中國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較<sup>4</sup>。

此後的錢穆，立場堅定，既宏揚所謂「中國文化」的意義和價值，也起而批判甚囂塵上的所謂「西化」思潮。例如，他對於中國知識群體討論任何問題都一意依傍外來思想制度，不以為然，斥責這是一種「次殖民地」的思想樣態：

中國人今日流行之代表思想，亦即一種次殖民地之思想也。今日國人談文化，談歷史，論政治，論社會，言建設，言改造，莫不引經據典，以彼土為依歸。曰英美，曰德意，曰蘇聯，群言龐雜，莫衷一是，此正次殖民地思想之最好標記也。

迴源溯流，讓錢穆得以將這種思想樣態概括為「次殖民地之思想」的依據，如其自述，來自於孫中山：

1 《國史大綱》成書於1939年，1940年6月初版，見李木妙：《國史大師錢穆教授傳略》（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八方文化企業公司〔聯合出版〕，1995年），頁77、162。

2 參見 Ying-shih Yü 余英時：「Changing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In Erik Lönnroth, Karl Molin, Ragnar Björk, eds.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Proceedings of Nobel Symposium 78*. Berlin &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94, p. 173；另參考黃俊傑：〈錢賓四史學中的「國史」觀：內涵、方法與意義〉，《台大歷史學報》，期26（台北：2000年12月），頁1-37。

3 即如余英時指出，錢穆「自《國史大綱》起才公開討論中西文化問題。他以鮮明的民族文化的立場表明了他在學問上的『宗主』」，見余英時：〈錢穆與新儒家〉，氏著《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台北：三民書局，1991年），頁41-42；當然，《國史大綱》的問世，意義多重，如王晴佳便指出，錢穆寫作《國史大綱》，亦標誌他與胡適、傅斯年為代表的「科學史學派」的決裂，見王晴佳：〈錢穆與科學史學之離合關係——1926～1950〉，《台大歷史學報》，期26（台北：2000年12月），頁121-49。

4 錢穆：〈紀念張曉峯吾友〉，《傳記文學》，卷47期6（台北：1985年12月），頁70。

近百年來，中國社會在其對外關係上，則陷為一破落赤貧階級而無以自拔，此等形勢，為中國社會創古所未經，惟孫中山先生巨眼識破，謂中國乃一次殖民地的國家，則今日之中國社會實乃一次殖民地的社會也。<sup>5</sup>

也就是說，錢穆完全接受孫中山創造的「次殖民地」這個詞彙（詳下），並認為孫中山視「中國乃一次殖民地的國家」是慧識睿見，甚至進一步地以「次殖民地之思想」來概括「中國人今日流行之代表思想」。細繹錢穆的思想世界，他贊譽孫中山的音符，始終傳唱不絕。早在 1920 年代中末期，當錢穆還是僻處江南一隅的中學教員時，教授「國學概論」這門課程發給學生的講義就已稱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有深閱博大之思，足以鼓動全國，以開未來學術思想之新機運」<sup>6</sup>。時過一甲子，1980 年代末期的錢穆，依復聲言「孫中山先生起，唱『三民主義』，尤為中國傳統政學合之一新發現、新創造」<sup>7</sup>，甚至於說孫中山是自己「一生中最佩服的人」<sup>8</sup>。那麼，從錢穆的思想脈絡來說，他奉孫中山「次殖民地」的創說為尊，仿若普遍真理，理有應然。

回到原來歷史脈絡，「次殖民地」本是孫中山創造的一個「新名詞」<sup>9</sup>。孫中山創說「次殖民地」這個詞彙，其實「有的放矢」，既是對於時代思潮的回應，也是建構自身革命理論的成果<sup>10</sup>。迴溯其源，「次殖民地」乃從「殖民地」這個「新名詞」脫胎而來，又與「半殖民地」這個已然在思想界流傳開來的「新名詞」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從今日的認識來說，「殖民地」、「次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這三個詞彙，應該與另一個「新名詞」：「帝國主義」相連共生；可是，從本來的思想脈絡言之，「帝國主義」卻與「殖民地」、「次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這三個詞彙之間最初沒有相關性，各由其逕。隨著這幾個「新名詞」的廣泛應用，並及中國知識人對它們的意義，漸有瞭解，認識深化，方始串聯貫通。合而觀之，這幾個「新名詞」則為中國知識人增添理解世界與思考自身國族定位，打開了寬闊的思想空間。

5 這兩段引文，均出自錢穆：〈中國社會之剖視及其展望〉，原刊《思想與時代》，期 4（1941 年 11 月），收入氏著《政學私言》（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2 年，台 3 版），頁 120-21。

6 錢穆：《國學概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台 1 版），頁 174-75；按，據此書〈弁言〉，是書「於民國十五年夏開始編著……於十七年春續成。前七章講於無錫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後三章講於蘇州江蘇省立蘇州中學」，是以當為錢穆於 1920 年代中末期之意見；此外，錢穆還特別指稱戴傳賢（季陶，1891-1949）是孫中山學說的「透關的發揮者」云云（同書，頁 179-87），不詳引論。

7 錢穆：〈中西政教之分合〉，原刊《聯合報》（1987 年 8 月 17-19 日），收入氏著《文化學大義》，《錢賓四先生全集》，總冊 37（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頁 204；按，「政學合之一新發現」疑為「政學合一之新發現」，不詳考訂。

8 方怡人：〈訪錢穆談中國之前途〉，《聯合月刊》，60 期（台北：1986 年 7 月），頁 30；這是錢穆在 1986 年 6 月 9 日「告別杏壇」的場合的談話。

9 孫中山屢言「次殖民地」這個詞彙是自己創造的「新名詞」，如：「……照我的研究，中國現在還不能夠到完全殖民地的地位，比較完全殖民地的地位更要低一級。所以我創一個新名詞，說中國是『次殖民地』，這就是中國現在的地位……」，見〈民族主義第六講〉（1924 年 3 月 2 日講），《國全》，1：53、《孫全》，9：240-41（餘例不詳舉）。

10 參考潘光哲：〈孫中山的次殖民地想像〉，發表於中山大學（主辦），「未竟之革命：重訪孫逸仙及其時代的思想資產國際學術研討會」（高雄：2011 年 11 月 13 日）。

因此，迴溯「次殖民地」的論說史（the discursive history of subcolony）<sup>11</sup>，它的誕生、問世與定著，絕非朝夕之功，回顧其變遷場景與歷史過程，錯綜複雜，正是近代漢語發展變遷的一個切片，義蘊所至，足可揭示，當前那些用來表達我們的思想的語言辭彙，即若「次殖民地」這個辭彙之定著，並成為後繼者（如錢穆那樣）在立論抒懷時足可取用的共同語言一般，經歷過一段從「新名詞」到「關鍵詞」（keywords）<sup>12</sup>的曲折歷程，必須回到「殖民」/「殖民地」這等「新名詞」誕生問世的整體歷史脈絡裡，發幽抉微，始可知其本末。引申言之，語言世界的那些標準規範，其實都是在具體的歷史脈絡裡，因應現實需求的產物；如何應用，怎麼書寫，其實未必理所當然，沒有什麼不許違犯挑戰的「天經地義」。透過對於相關課題原來歷史場景的述說，筆者並嘗試反省思考：開展「概念史研究」的時候，如何置諸原來的歷史脈絡裡進行探索，進而對於我們開啟歷史知識的生產活動的反思，拓展更為廣闊的空間。

## 二、「殖民」與「殖民地」的初期使用——「新名詞」的誕生

「西潮東漸」，為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的變動，提供無盡的動力泉源，語言文字的領域，也不例外，所謂的「新名詞」，紛紛出現，就是箇中著例。就當事人的省思來說，因應時代變遷和現實需要的產物，「新名詞」問世，理所當然。如當時的言論界鉅子梁啟超（1873-1929）在批判漢字如何妨礙了中國的進步的文脈裡指陳，人類社會持續變遷發展，新生事物和新興現象必然層出不窮，過去的詞彙文字想要描述「萬流匯逕、群族紛拏時代之名物意境」，實在無能為力，「新名詞」自然源源不絕，「一新名物新意境出，而即有一新文字以應之，新新相引而日進焉」<sup>14</sup>。約略同一時期的王國維也指陳曰，處於「西洋之學術駸駸而入中國」的時分，「則言語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勢也」，因此，「講一學，治一藝，則非增新語不可」<sup>15</sup>，「新名詞」當然如湧泉而來。從後來者的觀察總結而言，「新名詞」的義蘊豐富無比，實可視為

- 11 「次殖民地」的英文對應詞彙，或為“subcolony”（如 *Three Principles English Reader* 《三民主義英文讀本》，translated into simple English, with abridgement and adaption, from the original text of “San min chu-i,” with full notes and questions for class discussion by Baen Lee 李培恩,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28, p. 18 [讀取自 *China: Trade, Politics & Culture, 1793-1980* [http://www.china.amdigital.co.uk/Collections/doc-detail.aspx?documentid=3689], 讀取時間：2008年9月17日]）；或為“hypocolony”（如 Marie-Claire Bergère. *Sun Yat-sen*. 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61）。孫中山自稱，「這個次字，是由于化學名詞中得來的，如次亞磷便是。藥品中有屬磷質而低一等等者名為亞磷，更低一等等者名為次亞磷。又如各部官制，總長之下低一級的，就叫做次長一樣」（〈民族主義第二講〉[1924年2月3日講]，《國全》，1：17、《孫全》，9：202），故筆者以為，當以“subcolony”為宜（至於「次殖民地」的其餘英文對應翻譯例證，不詳遍舉）。
- 12 關於「關鍵詞」的研討取向，自應首推英國馬克思主義學者 Raymond Williams（1921-88）的先行貢獻：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至於這部書在 Raymond Williams 思想脈絡裡的地位及其影響，不詳述。
- 13 相關研究甚眾，例如周光慶、劉璋：《漢語與中國新文化啟蒙》（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年）。
- 14 原文甚長，不具引錄，見梁啟超：〈論進步（一名論中國群治不進之原因）〉，《新民叢報》，號10（1902年6月20日），頁4。
- 15 王國維：〈論新學語之輸入〉，收入《靜庵文集》，頁97A-100B；本文引用的是《王國維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按，本文原刊《教育世界》（1905年6月），見袁英光、劉寅生：《王國維年譜長編（1877-1927）》（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34。

「現代性」導入中國的具體徵象，這些「新名詞」或者直接反映了現代性物質文明的成果（如「蒸氣船」、「火車」等等），或是直接反映了現代性的制度及其實踐（如「議員」、「銀行」等等），或者凝聚了做為現代性之核心的某些價值觀念（如「科學」、「自由」、「人權」等等），亦或是現代學科知識和成果的學術術語（如「代數」、「化學」、「物理學」等等）<sup>16</sup>。因此，「新名詞」竄入人們日用語言世界的勢頭，根本抵過不了，市面上還出現了以《新爾雅》為書名，專門介紹「新名詞」的專書<sup>17</sup>，可見人們對瞭解「新名詞」，應用「新名詞」，確有此需。「殖民」／「殖民地」做為「新名詞」，其誕生、問世與定著，同樣也歷經過一段漸次始被認識理解的過程。

傳統漢語典籍裡，並無「殖民」或「殖民地」一詞；與之意義略相等同類似的詞彙，則為「藩屬」、「藩部」或「藩地」<sup>18</sup>。目前所知，即令早在 1886 年的《申報》即已出現「殖民」一詞<sup>20</sup>；只是，當人們開始認識「殖民」或「殖民地」的現象時，此等詞彙，既然古之不存，亦未至廣泛應用之境，則可以用來表述者，厥為傳統詞彙。例如，光緒十三年（1887），大清帝國派遣了十二位六部的中下級官僚遊歷各國，企望藉著他們的眼睛和思考，幫助大清帝國掌握更多世界大局的資訊<sup>21</sup>。成員之一劉啟彤（1854-98）<sup>22</sup>著有《英政概》、《法

16 參見黃興濤，川尻文彥譯：〈清末民初新名詞・新概念の「現代性」問題——「思想現代性」と現代性をおびた「社会」概念の中国での受容〉，《現代中国研究》，號 17（2005 年 9 月 30 日），頁 83-84；黃興濤另有關於「新名詞」的探索之作，不詳引註。

17 汪榮寶、葉瀾編纂：《新爾雅》，「上海明權社發行／光緒二十九（1903）年六月印刷」本，收入沈国威編著：《『新爾雅』とその語彙：研究・索引・影印本付》（東京：白帝社，1995 年）。

18 筆者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檢查《二十五史》與《十三經》，以「殖民」或「植民」進行檢索，僅於新校本《清史稿》發現結果，如：新校本《清史稿》卷 57：「兩岸沃野膏原，為殖民善地」（餘不詳舉）；民國初年一部對「新名詞」的「新義之原出載籍者，條分縷析」的著作，列有「殖民」一詞，對其在傳統漢語典籍之出處，則是《管子》：「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與《漢書·董仲舒傳》：「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見周商夫編：《新名詞訓纂》，「王子（1912）十一月唐詠裳序」，「上海掃葉山房民國七年石印」本，頁 10B，收入波多野太郎編：《中國語文資料彙刊》（東京：不二出版，1995 年，景印），篇 5，卷 3，頁 303。

19 筆者利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以「藩屬」、「藩部」或「藩地」進行檢索，結果如下：《明實錄》，卷 497：「琉球列在藩屬，固已有年」。《全唐文》，卷 39〈拔陁憐國王為恭化王文〉：「皇帝詔曰。於戲。王化所及。禮在於懷柔。藩部有歸。義存於冊命」。《嘯亭雜錄》，卷 7：「木蘭行圍制度」：「木蘭在承德府北四百里，蓋遼上京臨潢府、興州藩地也，素為翁牛特所據」（餘不詳舉）。

20 相關文脈，出現在《申報》關於日本開發北海道新聞之報導裡，其文略曰：「擬將北海道箱館、高知、札幌等三縣廢去，只設總督一員經理。故前已簡定岩村為總督，招募遊民，前往屯田開墾。岩村君於奉命後，即上書謂：北方瘦瘠之區，地曠人稀，氣候寒涼異常，當此實力整頓，務須拓土殖民，庶臻美善」，見《鈴洲新語》，《申報》，1886 年 3 月 18 日，版 2；又，1891 年《申報》報導日本「亞細亞協會」組成之新聞，載有會長副島種臣（1828-1905）之致詞，亦出現「殖民」一詞，其略言曰「此際我國果在何地位歟？若夫講我邦之地理、商況、兵制、殖民、歷史、會計、學術，以導未開之地，以扶不幸之國」，見《盛會重興》，《申報》，1891 年 7 月 29 日，版 1。綜上二例，略可揣想，既都與日本新聞相關，《申報》會出現「殖民」一詞，應即取材於日本媒體。

21 關於清廷派遣這 12 位官僚遊歷各國的總體研討，參見佐々木揚：《清末中国における日本観と西洋観》（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 年），章 3〈1880 年代末における清朝遊歴官の外国事情調査〉（頁 189-281）。

22 據佐々木揚研究，1887 年時，劉啟彤 33 歲，則應生於 1854 年，係 1886 年進士，時任兵部學習主事，死時 44 歲，則應為 1898 年，參見佐々木揚：《清末中国における日本観と西洋観》，頁 202-203。

政概》與《英藩政概》這三部書，就使用「藩部」來述說英國的殖民部（The Colonial Office），以「藩屬」或「藩地」稱謂其殖民地：

政在議院……有密邇於君者，謂之政府，其人十有八：……八曰藩部大臣，……藩地，英名「可羅尼司」，其大臣之稱與外部同，掌各藩地之事……<sup>23</sup>。

英人自明季始立藩屬。二百年來，蠶食之地，徧於五洲，約八百六十萬方里，大於其本國三島六十六倍，所轄人民六倍於其本國。<sup>24</sup>

所謂「可羅尼司」即“Colonies”。可以揣想，劉啟彤並不能在既有的漢語世界裡，找到可以與之對應，並能清楚明白表達其意義的恰當詞彙，只能以傳統詞彙來表達這等現象。

稍後未幾，情況便已有改觀。最好的例證，便是梁啟超發表於一八九七年出版的《時務報》的文章裡，不僅使用了「殖民」一詞，更特別對「殖民地」一詞做出解釋：

歐洲何以強？歐洲壤地最徧，生齒最盛，自四五百年前即憂人滿，於是哥命波朮探新地，闢阿墨利加大洲，而印度、非洲、南洋、澳島相繼墾殖，徙歐民以實之。莽莽五洲，輒跡殆滿，是以白種之權利徧天下。使歐人以丸泥自封，閉關勿出，今雖以瘠亡可也。雖然，殖民之政（日本人稱屬地為殖民地，蓋人滿則徙之他地以殖之也）行之數百年矣，其真能盡地利者，今惟合眾一國……<sup>25</sup>。

既然他需要對「殖民地」一詞做出解釋，可以推想，那還並不是眾所公知的詞彙。

檢查《時務報》的其他文章，「殖民」與「殖民地」二詞，屢見不鮮<sup>26</sup>，惟則，最早出現的是「植民地」一詞：

自歐洲來往至東方亞洲之輪船公司……于英則有半島及東方公司……等公司，……其船……沿途停泊於聯合王國，及歐洲大陸，有八處至十處不等，歐洲外則停泊各殖民地、印度、中國及日本等之各公開埠頭……<sup>27</sup>。

23 劉啟彤：《英政概》，《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續編》，第11帙，頁3B、4B。

24 劉啟彤：《英藩政概》，《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續編》，第11帙，頁1A。

25 新會梁啟超：〈論中國之將強〉，《時務報》，冊31（1897年6月30日），景本冊3，總頁2078；本文引用的版本是《強學報·時務報》（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景印，全5冊）。

26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統籌：《近現代漢語新詞源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2年）指稱，「殖民」與「殖民地」首見於1903年與1898年（頁341）；蔣英豪認為，此二詞於1896年的《時務報》冊4與冊6便已出現（見蔣英豪：〈梁啟超與近代漢語新詞〉，《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期44〔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4年〕，頁394）。

27 古城貞吉譯：〈來往歐亞兩洲輪船情形〉（東文報譯／譯東京日字報西七月初七日），《時務報》，冊3（1896年8月29日），景本冊1，總頁180。不過，未可得見《東京日字報》（即《東京日日新聞》）原件。

此後，「殖民」以及「殖民地」乃至於由「殖民」相結合衍生的其他詞彙，都出現在《時務報》讀者的面前：

A·「殖民」 / 「殖民地」	例①：夫拓地殖民之業，固待我日人之渡航移住而成也…… <sup>28</sup> 。 例②：俄人注目於亞洲大陸，最致力於西伯利亞一帶，興利殖民…… 額爾古納河畔一帶……均足為一大殖民地。 <sup>29</sup>
B·「殖民」的衍生詞	例①「殖民省」：他國舉外交殖民之二事，一任諸外務省及殖民省…… <sup>30</sup> 。 例②「殖民自治地」：英人睥睨地球，如囊中物，而馬關一帶，至蘇士運河之口，又見英國殖民地，犬牙交錯，鱗壤相屬焉……今試分其屬地為三：一曰殖民自治地，二曰直隸國家殖民地，三曰印度帝國…… <sup>31</sup> 。 例③「殖民政策」：刊有以「殖民政策」為篇名之譯文。 <sup>32</sup>

這些文稿，都是列名為《時務報》「東文繙譯」，擔任日文譯稿工作的日本人古城貞吉（1866-1949）的筆耕成果。<sup>33</sup>從例 A·①來看，更可想見，在古城貞吉的認識裡，日文的「拓殖」可以替換為漢語的「拓地殖民」。

同一時期的其他媒體，也總可找到「殖民」與「殖民地」二詞出現的跡象。例如，《實學報》是 1890 年代中期維新時期「最足以動守舊者之聽，且足以奪維新者之心」的刊物，<sup>34</sup>立場比較保守，身為該刊「撰述編校」的孫福保（生卒年不詳），依據以日本《時事新報》為本，翻譯介紹美國養雞事業的文稿即出現「殖民地」<sup>35</sup>一詞；其以日本《經濟雜誌》為據，翻譯述說「非尼西亞國」歷史的文章，介紹了「非尼西亞國」在「埃及殖民地之實際」，而

28 古城貞吉譯：〈論日人經營台灣〉（東文報譯／譯東京日日新報西八月初四日），《時務報》，冊 4（1896 年 9 月 7 日），景本冊 1，總頁 242；日文原文是：「且つ夫れ臺灣拓殖の業を舉げんには多く内地人の渡航若くは移住を促がさらべから」，見〈台灣的經綸（二）〉，《東京日日新聞》，1896 年 8 月 5 日，2 版。

29 古城貞吉譯：〈論西伯利亞將來大局〉（東文報譯／譯國民雜誌西二月十三日），《時務報》，冊 20（1897 年 3 月 13 日），景本冊 2，總頁 1360-61。

30 古城貞吉譯：〈俄人論英國海外政策〉（東文報譯／譯東京日日報西八月廿八日），《時務報》，冊 6（1896 年 9 月 27 日），景本冊 1，總頁 380-81。

31 古城貞吉譯：〈論英國殖民政策〉（東文報譯／譯國民報西九月十一日），《時務報》，冊 11（1896 年 11 月 15 日），景本冊 1，總頁 731-32；按，原稿為深井英五：〈英國の殖民政畧（上）〉，《國民新聞》，1896 年 9 月 11 日，1 版（原稿為「英國の殖民地」、「自治殖民地」及「直轄殖民地」）。

32 古城貞吉譯：〈論英國殖民政策〉（東文報譯／譯國民報西九月十一日），《時務報》，冊 11（1896 年 11 月 15 日），景本冊 1，總頁 731-32；古城貞吉譯：〈德國海軍及殖民政策〉（東文報譯／譯國民新報西八月十七日），《時務報》，冊 39（1897 年 9 月 17 日），景本冊 3，總頁 2672。

33 依據沈國威的考證，從 1896 年夏天到 1897 年底的大部分時間，古城貞吉都在上海逗留，擔任《時務報》「東文繙譯」的工作，見沈國威：〈關於古城貞吉的《滬上銷夏錄》〉，《或問》（大阪：近代東西言語文化接觸研究會，2004 年 10 月 30 日），頁 155-60。

34 湯志鈞：《戊戌時期的學會和報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3 年），頁 439。

35 湯志鈞：《戊戌時期的學會和報刊》，頁 443。

36 原文是：「今本邦人既欲於此國為殖民地，步其副產業之可獲利者，必以該事業為起家之法……」，見吳縣孫福保譯：〈美國之養雞事業〉（東報輯譯／譯時事新報西九月九日），《實學報》，冊 6（1897 年 10 月 16 日），頁 363；本文引用的版本是《實學報》（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景印）。

且「地中海之西半」為其「殖民地之大中心」的一部分，也於紀元前一千一百一年之際在「矮之氣卡」此地開始「殖民」<sup>37</sup>；至如《知新報》同樣取材於《東京日日新報》的譯稿，論說如何保守「殖民地」<sup>38</sup>。嚴復曾參與筆政之《國聞報》，也說法國人想要「在亞洲開拓殖民地」<sup>39</sup>。饒有興味的是，同一時期刊載於《昌言報》原來資料出處不得其詳的譯稿，則將「藩屬地」與「殖民地」並用：

英、法二國於阿非利加，各有藩屬地……阿非利加洲中開普埃及之間、別有一地，……東濱於印度洋，南接於德國領地，北與阿比西尼亞及義大利殖民地鄰，該地本係三日哈爾酋長所治，英國存其虛名，而取其實權……<sup>40</sup>。

綜上相關例證，可以想見，「殖民」與「殖民地」在 1890 年代中期諸多媒體之間世，且漸次廣傳，為眾所知，實與日本脫離不了關係。即如康有為自述撰成於光緒廿三年（1897）五月杪的《日本書目志》<sup>41</sup>，即列有《海外殖民論》一書<sup>42</sup>；後來，東渡日本的雲南留學生在東京創辦《雲南》，創刊號登有署名「江澤」者的〈論殖民之種類〉一文，則取材自山內正瞭（生卒年不詳）的《殖民論》，敘述關於殖民地的各種學說<sup>43</sup>。因是，從整體脈絡言之，有如古

37 原文是：「為非尼西亞人於埃及殖民地之實際也。……非尼西亞人殖民地之大中心，在地中海之西半……矮之氣卡之殖民，則在紀元前一千一百一年之際」。吳縣孫福保譯：〈非尼西亞國史〉，《實學報》，冊 13（1897 年 12 月 24 日），頁 796、800、801；是文初刊時《實學報》註明「日本《經濟雜誌》本」（頁 687）。

38 原文是：「夫邦域已廣大，又獲殖民地者，世界國民所共快也……獲得土地雖不易，而能長相保之。使國民得殖民地之繁榮。則更難也」，〈論保守屬地之難（時論輯譯／譯西五月二十八號東京日日新報）〉，《知新報》，冊 63（1898 年 8 月 27 日），頁 860；本文引用的版本是《知新報》（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出版〕，1996 年）。

39 原文是：「法人得滇、粵、海南，則其欲在亞洲開拓殖民地，與奪英人商利之願亦償矣，固無所用其戰」〈書本館譯報後〉，《國聞報》，1898 年 4 月 21、23 日，王忞主編：《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冊 2，頁 480；本文是否為嚴復撰著，不詳考究。

40 〈法壽達案始末記（英文譯編）〉，《昌言報》，冊 10（1898 年 11 月 19 日），頁 599、601-602；是文文末註明「此稿未完」，以《昌言報》本期出版後即停刊，故出處不詳；惟既列為「英文譯編」，似應自英文文稿譯出；本文引用的版本是《昌言報》（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景印）。

41 例如，《時務報》的譯稿即為當時的各類《經世文編》收錄，更可想見，其間蘊涵之資訊與詞彙，可藉之廣傳眾知的面向，試舉一例，如〈德國海軍及殖民政策〉一文，分別收入以下幾種《經世文編》：麥仲華輯：《皇朝經世文新編》（1898 年），卷 16 中「外史」；邵之棠輯：《皇朝經世文統編》（1901 年），卷 16，「地輿部一／地球事勢通論」；浙東宜今室編輯：《皇朝經濟文新編》（1901 年），「君德卷一」，見日本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編輯：《經世文編總目錄》（東京：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1956 年），分冊 2，頁 153、10、208。

42 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收入樓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編年譜（外二種）》（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頁 33。

43 關於康有為之《日本書目志》的研究，可以參見：沈國威：〈康有為及其『日本書目志』〉，《或問》，號 5（東京：白帝社，2003 年 1 月），頁 51-68。

44 是書資料如下：「《海外殖民論》一冊 恒屋盛服著 三角五分」，見康有為：《日本書目志》，收入姜義華編校：《康有為全集》，集 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頁 771；沈國威指出，「殖民論」即為首見於《日本書目志》的日本新詞，沈國威，〈康有為及其『日本書目志』〉，頁 61。

45 江澤：〈論殖民之種類〉，《雲南》，號 1（1906 年 10 月 10 日），羅家倫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台

城貞吉、孫福保等為譯手，直接由日本報刊取材，有如康有為或是稍後的日本留學生向日本「取經」，引介相關書目與資料，那麼，「殖民」與「殖民地」其實乃都是來自於日本的「新名詞」。<sup>46</sup>

相較於劉啟彤以音譯「可羅尼司」來翻譯“Colonies”的情境，當「殖民」與「殖民地」等詞彙進入漢語世界之後，就讓人們可以不再使用「藩屬」等傳統漢語的詞彙進行翻譯。人們顯然已經知道可以用「殖民」來翻譯英文的“colonize”，「殖民地」可以等同於英文的“colony”。例如，嚴復取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9-90）的名著《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譯為《原富》<sup>47</sup>，關於原著詳論“colony”的部分，嚴復基本上採用了「殖民地」一詞：

Adam Smith. <i>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i> <sup>48</sup>	嚴復譯：《原富》 <sup>49</sup>
<i>Of Colonies</i>	〈論外屬〉（亦譯殖民地）
<i>Of the Motives for establishing new Colonies</i>	以下論新地所以開闢之故。
<i>Greek colonies were sent out when the population grew too great at home. The interest which occasioned the first settlement of the different European colonies in America and the West Indies, was not altogether so plain and distinct as that which direc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ose of ancient Greece and Rome.</i>	歐洲國有外屬，尚矣。古希臘羅馬之所以拓國也，始皆以救過庶之患，資殖民而已。挽近英、法、波、西之置外屬於南北美、西印度也，雖亦有殖民之用，顧其所始，常委曲而難明，不若古者希羅之事顯而易見也。

嚴復進行翻譯事業，為創造譯語而「冥思苦索，刻意創立」，既不與來自日本的譯詞為然，更要與「東學」、「東語」相抗爭；可是，在「新名辭」的「戰爭」裡，他卻成了不幸的「輸

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8年，影印初版），總頁085-091；原文清楚註明乃「摘抄《殖民論》第三章」，其原著則為山内正瞭：《殖民論》（東京：金刺芳流堂，1905年〔東京：国立国会図書館蔵書〕），頁37-45；至於詳盡比對江澤譯文與山内正瞭原著，非本文可為。

46 至於「殖民」（植民）一詞在日本的情況，也歷經演變，蘭學者稻村三伯（1758-1811）等編輯日本最早的「蘭和辭典」《ハルマ和解》（1796年完成）譯“colonie”為「開國」，“Volkplanting”為「人民を植る」；另一位蘭學者志筑忠雄（1760-1806）的《鎖国論》（1801年）則譯“Volkplanting”為「植民」；箕作省吾（1821-47）的《坤輿圖識補》（1847年）則以「植民」一辭描述西方人在國外的進出活動；堀達之助（1823-94）編輯的日本第一部公開發行的「英和辭書」：《英和对訳袖珍辭書》（1862年版），則將“colonie”譯為「人ヲ殖コト」，“settler”譯為「殖民」，至後來將此書二版與三版：《改正增補英和对訳袖珍辭書》（1865年與66年）將“colony”譯為「殖民」，見：黑田謙一，《日本植民思想史》（東京：弘文堂書房，1942年），頁17-18。

47 嚴復在1896年至1901年間翻譯《國富論》為《原富》，出版於1901至1902年間，見賴建誠：《亞當史密斯與嚴復——《國富論》與中國》（台北：三民書局，2002年），頁9。

48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notes, marginal summary, and enlarged index by Edwin Cannan;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John Kenneth Galbraith,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93, p. 599；引文斜體字部分，本於原著。

49 嚴復譯：《原富》，《嚴譯名著叢刊》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頁446-47。

家」。<sup>50</sup>然而，嚴復行文之際，卻還是不得不使用源於日本的詞彙，「殖民地」一詞便是具體例證；正可想見，時代言論趨向既然如此，嚴復自難可獨力頡頏風潮。

孫中山著作的漢譯本，則是另一個例證。孫中山於 1904 年在美國發表了 *The True Solution of the Chinese Question* 單行本的英語著作，是年底被譯為漢語：《支那問題真解》（現行漢譯篇名為〈中國問題的真解決〉<sup>51</sup>），試列表比較譯稿：

英文原文	《支那問題真解》	《中國問題的真解決》
European possessions in Africa which had hitherto been the bone of contention between the European powers having now been pretty well defined, a new field for territorial aggrandizement and colonial expansion must therefore be sought…… <sup>52</sup>	歐人營領土於亞非利加，其大勢已定，無復餘事，故必更尋新地以施其殖民之政策…… <sup>53</sup>	那斐洲地方能夠得到的權利，做歐洲列強爭奪的焦點的地方，現今完全解決了，所以必須另行覓到一塊新的地方，以達到他領土的增加，與和殖民地的擴張…… <sup>54</sup> 【另一篇譯文：歐洲人在非洲的屬地——迄今為止，這一直是歐洲列強之間鬥爭的焦點——現在大體上已經劃定了，因而必須尋找一塊新的地方，以供增大領土和擴展殖民地…… <sup>55</sup> 】
There are two conflicting policies pursued by the foreign powers in regard to China. The one favors the partitioning and colonizing; the other advocates the integrity and colonizing; the other advocates the integrity and independence of China. To those maintaining the former policy it is needless to remind them that it is fomented with danger and disaster, as the case of colonizing Manchuria by Russia exhibits…… <sup>56</sup>	外人之對於支那者有二政策，而曾不相容：其一主張支那瓜分，其一辨護支那獨立。由前而觀，則露西亞用之以有今巨創，其主義為不祥…… <sup>57</sup>	列強各國對於中國，有兩種互矛盾的政策，一種就是專心做那分割而開拓殖民地，還有代辯領土完全而開拓殖民地，又有一種是代辯中國的領土完全和獨立的。主張前一種政策的，吾們一望可知是含著危險和禍害，恐怕和俄羅斯的開拓東三省做殖民地，是同一情形的…… <sup>58</sup> 【另一篇譯文：列強各國對中國有兩種互相衝突的政策：一種是主張瓜分中國、開拓殖民地；另一種是擁護中國的完整與獨立。對於固守前一種政策的人，我們無需乎去提醒他們那種政策是潛伏著危險與災難的，俄國在滿洲殖民的情況已表明了這一點…… <sup>59</sup> 】

50 參見黃克武：〈新名詞之戰：清末嚴復譯語與和製漢語的競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62（台北：2008 年 12 月），頁 1-42。

51 孫中山的 *The True Solution of the Chinese Question*（《國全》，5：111-21），于 1904 年 8 月 31 日在美國聖路易（St. Louis）完稿，部分文字由王寵惠撰寫，是年底被譯為漢語：《支那問題真解》（《國全》，2：75-80、《孫全》，1：243-48），在日本以漢英語合本形式發行（見《國譜》，頁 247-48、《孫譜》，頁 317）；至於譯之為《支那問題真解》者為胡漢民與胡毅生（《國全》，2：74、80）；現行漢譯篇名是：《中國問題的真解決》（《國全》，2：67-74、《孫全》，1：248-55〔篇名為《中國問題的真解決——向美國人民的呼籲》〕）。

52 *The True Solution of the Chinese Question*，《國全》，5：111。

53 〈支那問題真解〉，《國全》，2：75、《孫全》，1：243（惟「無復餘事」一句做「無復餘」）。

54 〈中國問題的真解決〉，《國全》，2：75。

55 〈中國問題的真解決——向美國人民的呼籲〉，《孫全》，1：248。

56 *The True Solution of the Chinese Question*，《國全》，5：119。

57 〈支那問題真解〉，《國全》，2：79、《孫全》，1：247。

58 〈中國問題的真解決〉，《孫全》，1：72-73。

59 〈中國問題的真解決——向美國人民的呼籲〉，《孫全》，1：254。

《支那問題真解》的譯文，將“colonial expansion”譯為「殖民之政策」，“colonizing Manchuria”則完全未譯（現行翻譯則已分別譯為「殖民地的擴張」或「擴展殖民地」、「開拓東三省做殖民地」或「在滿洲殖民」）。可以想見，在孫中山發表這篇論著的時候，至少“colonize”與“colony”等英文詞彙不再受限於既有的漢語世界，已經找到了可以具體的對應詞彙，表達其意義。

### 三、做為「規範詞彙」的「殖民」與「殖民地」

大致而言，「殖民」與「殖民地」等詞彙約略於 1890 年代中期在漢語世界裡問世，迅即廣傳遠播，基本上已然成為人們同識共曉的「規範詞彙」（the normative vocabulary）<sup>60</sup>，在公私領域，應用廣泛。

像是這個詞彙可以見諸於 1898 年的皇帝諭旨，將諸等「興國殖民之計」的事業列為獎勵對象；<sup>61</sup>論者於媒體立言，並可信手捻來，如《申報》述說歐洲大局，諸國相爭，各國惟有「推廣殖民之策」始可「自立」。<sup>62</sup>梁啟超翻譯柴四朗（1853-1922）以「東海散士」為筆名創作的政治小說《佳人之奇遇》為《佳人奇遇》，從《清議報》創刊初始連載，即明確指出「聖土奴民噉」是法國的「殖民地」：

聖土奴民噉者，西印度中之一島，佛國殖民地之一也。<sup>66</sup>

當梁啟超申論「有冒險獨立之性質」乃是「中國人種」的「特質」之一時，便聲言道，「中國人種」實在「能有實力以開通全世界」，所以他大膽論斷：

- 
- 60 「規範詞彙」借用自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的表述，參見 Quentin Skinner.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vol. 1, pp. x-xi（當然，昆廷·斯金納提出「規範詞彙」的論說與他的思想史方法論，密切相關，本文不詳述）。
- 61 按，這是光緒廿四年五月十七日（1898 年 7 月 5 日）「上諭」的內容，略曰：「……有能獨力創建學堂，開闢地利，興造槍砲各廠，有裨於興國殖民之計者，並著照軍功之例，給予特賞，以昭鼓勵……」，翦伯贊等編：《戊戌變法》，《中國近代史料資料叢刊》（上海：神州國光社，1953 年），冊 2，頁 81。
- 62 原文是：「歐羅巴地與亞洲昆連，大小數十國，犬牙相錯，各矜智力以爭雄強，時而干戈，時而玉帛，局勢實與春秋列國相似。……四鄰相逼，鷹瞵鴟視，非兼併弱小，擴張屬地，以推廣殖民之策，斷不足自立於諸強國之間也」（論美國漸思干涉外事），《申報》，1898 年 8 月 12 日，版 1。
- 63 關於柴四朗及其《佳人之奇遇》的研究甚眾，如高井多佳子：〈東海散士著『佳人之奇遇』の成立について〉，《京都女子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研究紀要・史学編》，号 3（京都：京都女子大学，2004 年），頁 59-86（餘例不詳舉）。
- 64 本文引用的版本是《清議報》（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景印，全 6 冊）。
- 65 關於梁啟超翻譯的《佳人奇遇》研究甚眾，如大村益夫：〈梁啟超および『佳人之奇遇』〉，《人文論集》，号 11（東京：早稻田大学法学会，1974 年 2 月），頁 103-33、李慶國：〈《佳人之奇遇》原版本的抹消及試訊〉，《清末小説から》，号 56（清末小説研究会，2000 年 1 月），頁 12-16（餘例不詳舉）。
- 66 〈佳人奇遇〉，頁 2，《清議報》，冊 6（1899 年 2 月 20 日），景本冊 1，頁 1035；日文是：「聖土奴民噉ハ西印度ノニシテ仏国殖民地ノ一ナリ」，見東海散士：《佳人之奇遇》，收入大沼敏男、中丸宣明校注：《政治小説集・二》，《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明治編》，冊 17（東京：岩波書店，2006 年），頁 263；至於「聖土奴民噉」，即伊斯帕尼奧拉島（Hispaniola / 西班牙語 La Española）。

北米與澳洲今為白種人殖民地之區域，南米與非洲他日必為黃種人殖民地之區域，無可疑也。<sup>67</sup>

《清議報》編者（梁啟超？）更指陳，中國「內政不修，民生日蹙，官不殖民，而民始謀自殖」，但因為「有殖民之責者，至今不悟，又不能因勢利導，以實行殖民之政，無怪煙賭開場，鎗斃人命，如此辱國之甚者，時有所聞也」，因此開闢了「殖民雜俎」專欄，專門報導海外華人的情況。<sup>68</sup>又如 1906 年創刊的《雲南》，刊布〈發刊詞〉，也聲言「烏拉山西，地中海北之碧眼黃髮兒」，已然「挾其遠洋殖民之政策，奮其膨脹勢力之野心」，隨著「十九世紀之歐風美雨以東來」，以致中國和雲南這樣的「大好江山，極樂世界，遂不幸成福蘭克、薩克孫兩族相爭之焦點」。<sup>69</sup>一般的讀書人如孫寶瑄（1874-1924）在日記裡也留下了 1908 年的《順天報》（應即《順天時報》）載有德國在「南非洲殖民地」相關局勢的新聞。<sup>70</sup>

除了《清議報》或是《順天報》等公共媒體之外，私人領域裡也普遍應用「殖民」與「殖民地」等詞彙。孫寶瑄與朋友談話，言及朝鮮的情況，就說由於朝鮮的「裁判權、警察權、教育權」等皆受日本控制，日本「又移其國民來朝鮮墾荒」，所以朝鮮就像日本的「殖民地」一樣。<sup>71</sup>孫中山的私人信函裡也使用「殖民地」一詞，如他致函鄧澤如（1869-1934），告知已將「中國同盟會」改為「中華革命黨」，也明確地指稱「南洋」地區是法、英的「殖民地」。<sup>72</sup>

不論是報刊、小說或是論文亦或私人信函，凡使用「殖民地」這等詞彙的時候，梁啟超或孫中山都不需要加以解釋，認為讀者／聽者必定知其意涵。顯然，這些詞彙在漢語世界裡已然「登堂入室」，眾知共識，各家論者乃可毋需思索，信手言之。如陳家鼎（1879 或 80-1928）以「鐵郎」為筆名，在〈二十世紀之湖南〉一文裡暢言湖南在湘軍消滅太平天國之後，勢力遍佈中國，便如是形容：

67 哀時客（梁啟超）：〈論中國人種之將來〉，頁 4，《清議報》，冊 19（1899 年 6 月 28 日），景本冊 2，頁 1189。

68 〈殖民雜俎〉，《清議報》，冊 34（1900 年 1 月 31 日），頁 12-13，景本冊 3，頁 2213-14。

69 原文是：「孰知烏拉山西，地中海北之碧眼黃髮兒，攜其友朋，率其醜類，挾其遠洋殖民之政策，奮其膨脹勢力之野心，雷驚電掣，海沸山崩，竟隨十九世紀之歐風美雨以東來，鷹瞵虎視，各爭要區。而此大好江山，極樂世界，遂不幸成福蘭克、薩克孫兩族相爭之焦點」，見〈雲南雜誌發刊詞〉，《雲南》，號 1（1906 年 10 月 10 日），頁 2（文頁），羅家倫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8 年，影印初版），總頁 008。

70 原文是：「《順天報》載：德國欲改南非洲殖民地為保護國，議會力抗之」，見孫寶瑄：「光緒卅四年十二月廿三日（1908 年 1 月 26 日）日記」，氏著《忘山廬日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頁 1132。

71 原文是：「至順天府署，在黃春生室中譚……春生當俄日戰時，在朝鮮，目睹仁川之役，為言戰時情狀，歷歷可繪。又云：朝鮮近已被滅於日本，雖存虛名，與無國同。蓋無論裁判權、警察權、教育權，一聽命於東人，日又移其國民來朝鮮墾荒，隱然為其殖民地」，見孫寶瑄：「光緒卅二年八月廿四日（1906 年 10 月 11 日）日記」，《忘山廬日記》，頁 929。

72 原文是：「中國同盟會會員字樣，今改為中華革命黨黨員，以得名實相符，且可避南洋各殖民地政府之干涉。蓋各殖民地有例嚴禁私會，而法英兩殖民地前年已公認革命黨為政治之團體，法安南送黨人出境，而英殖民地收納之是也」，〈由檳城致鄧澤如告改訂同盟會分會新章等事函（三）〉（1910 年 8 月），《國全》，3：125、〈覆鄧澤如函〉（1910 年 8 月 24 日），《孫全》，1：477。

73 陳玉堂編著：《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詞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年），頁 525。

……自金陵一役，湘人覓噉飯所者，皆率其妻子來吳，吳遂稱湖南殖民地焉。<sup>74</sup>

把湖南人舉家遷移往居江南的現象，詮釋為江南一地是湖南人的「殖民地」，恰既與梁啟超對「殖民地」一詞之解釋「徙之他地以殖之」若合符節，也與今日吾人之認知沒有太大差距。

至如有署名「志復」者，在《雲南》發表〈滇緬界事述略〉一文，申論緬甸的「存亡」，對於「中國前途有如何影響」，則從緬甸「與中國交通，歷有年所」的脈絡出發，指陳彼方「人民」既然「已經久通中國，居處習俗，已多同化之點，且漢人所在，與之雜處」，所以「緬甸非惟我之屬地，乃我之殖民地也」<sup>75</sup>。凡是華人遷徙中國本土以外的地區，就將之視為中國的「殖民地」，這等認知，在梁啟超那裡「異曲同工」，他撰著〈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以明代以降的梁道明（生卒年不詳）、張璉（生卒年不詳）等八人為「中國殖民八大偉人」，並還聲言「海以南百數十國，其民口之大部分皆黃帝子孫。以地勢論，以歷史論，實天然我族之殖民地也」<sup>76</sup>。相較於梁啟超〈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的深遠意義，「志復」的〈滇緬界事述略〉一文，好似「明日黃花」，並未激起迴響<sup>78</sup>；然而，雙方論證這些區域是中國「殖民地」的理由，基本上並無二致。可以想見，思想言論界對於「殖民地」的認識，交集互疊。

#### 四、從「瓜分」到「殖民地」

「殖民」與「殖民地」這等詞彙概念提供給中國的，不僅僅是某種現象的描述概括，更供應了思想變遷的動力，為中國的自我認知，別開新面。從歷史的脈絡來說，由於「西潮東漸」引發的世局變動，早即在中國思想界激起無數的迴響，諸如屢屢在對外戰爭中遭敗受挫，國家主權的淪喪，利權的失損等等場景，官僚士紳言之鑿鑿，要求修改不平等條約，收回領事裁判權、關稅自主權等等論說，早已問世<sup>79</sup>，卻不曾將中國視為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對象，也未提出中國可能會成為「殖民地」的言論。

如孫中山在 1894 年底檀香山興中會成立時提出的〈檀香山興中會成立宣言〉，描述中國處於「強鄰環列」的情境下，五金物產已陸續被「蠶食鯨吞」，甚至於更將被「瓜分豆剖」<sup>80</sup>。

74 鐵郎：〈二十世紀之湖南〉，頁 2，《洞庭波》，期 1（1906 年 10 月），收入羅家倫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8 年，影印初版），總頁 136。

75 志復：〈滇緬界事述略〉，頁 1-2、6（文頁），《雲南》，號 1（總頁 077-078、總頁 082）。

76 中國之新民：〈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新民叢報》，號 63（第三年第十五號），光緒三十一年正月十五日（1905 年 2 月 18 日），頁 81-88。

77 沈松僑從梁啟超構建的「民族英雄系譜」整體脈絡出發，論證自從梁啟超〈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一文出，兼駭「國家」、「國民」二義並以「民族帝國主義」雄圖為最終鵠的之國族圖像，從此在近代中國思想界成形，見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33（台北：2000 年 6 月），頁 142-43。

78 例如，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編：《雲南雜誌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 年），即未收入此文；可以想見，後世史家也不看重此文的思想史意義。

79 參見王爾敏：〈晚清外交思想的形成〉，收入氏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論》（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年），頁 191-202。

80 原文是：「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檀香山興中會成立宣言〉（1894 年 11 月 24 日），《國全》，1：755、《孫全》，

康有為於一八九五年時也說，在「甲午之役」後，大清帝國危如累卵，恐遭「瓜分之患」<sup>81</sup>，他還生動地描述中國全方位地被俄國、英國、法國與日本四個「強鄰」包圍，也是其他國家覬覦對象的危險處境：

俄北瞰，英西睽，法南隣，日東眈，處四強鄰之中而為中國，岌岌哉！況磨牙涎舌，思分其餘者，尚十餘國。遼、臺茫茫，回變擾擾，人心皇皇，事勢僂僂，不可終日。<sup>82</sup>

在他們的認知裡，中國是被「瓜分」的對象，國族處境儼然岌岌可危。「瓜分」一詞，在中國傳統典籍裡古已有之，此際成為諸方論者描述中國現實局勢的詞彙。如康廣仁即指出，1898年德國佔領膠州灣之後，諸國旋即進逼，「英、日兵船駐于舟山」，「俄國兵艦駐于旅順，而法艦亦將來矣」，甚至於「意、奧、西班牙、葡萄牙、瑞典、丹麥、暹羅接踵而來，咸分一鬻」，因此，中國實處於「瓜分在即，罔知死所」的處境。<sup>83</sup>翌年，梁啟超更有〈瓜分危言〉之作，全面指陳中國瀕於被「瓜分」之危局，蓋西方諸國雙管齊下，以「無形之瓜分」、「有形之瓜分」兩種方式侵略中國。「有形之瓜分」即如波蘭被俄、普、奧三國滅亡一樣，中國雖未臻此境，然若「鐵路權」、「財權」、「練兵權」、「用人權」都操諸他國之手，乃至於中國被迫簽定「借地及訂某地不許讓於他國之約」，事實上都是西方諸國對中國的「無形之瓜分」，已經讓「中國之精血，瓜分已盡」<sup>84</sup>。梁啟超提出「無形之瓜分」的論說，也為後來論者所繼承，如馮自由（1882-1958）等人創辦《國民報》（1901年5月創刊於日本東京），屢屢刊出激揚革命情緒的著述，創刊初始即刊布〈二十世紀之中國〉，聲言「列強之亡中國也，視嚮者領澳割非，專恃強力者，異矣。其用無形瓜分之手段，愈巧而愈密」<sup>85</sup>。至於注意爭取「群眾」的革命志士，也和二十世紀初期以下層社會群眾為目標的「啟蒙運動」風潮，相互呼應，採取了與這波「啟蒙運動」類似的手法，要將「革命種子」深植於人心。如陳獨秀

1：19。

- 81 原文是：「竊近者朝鮮之變，日人內犯，致割地賠餉，此聖清二百餘年未有之大辱，天下臣民所發憤痛心者也。然辱國之事小，外國皆敢覬覦，則瓜分之患大；割地之事小，邊民皆不自保，則瓦解之患大。社稷之危，未有若今日者」，見康有為：〈上清帝第三書〉（1895年5月29日），收入姜義華、吳根樑編校：《康有為全集》，集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132-59。
- 82 康有為：〈京師強學會序〉（1895年9月），《康有為全集》，集2，頁185。
- 83 筆者利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以「瓜分」一詞進行檢查，結果發現唐代已有此詞，鄭少微：〈對文可以經邦策〉，《全唐文》，卷396：「三雄鼎立。四海瓜分。魏氏獨跨於中原。孫劉割據於南土」（餘不詳舉）。
- 84 南海康廣仁：〈聯英策〉，《知新報》，冊45（1898年3月3日），頁1A（景本冊1，頁557）。
- 85 哀時客：〈瓜分危言〉，《清議報》，冊15-17（1899年5月20日～6月8日）、《清議報》，冊23（1899年8月6日）。
- 86 關於《國民報》的介紹，參見郭永才：〈國民報〉，收入丁守和主編：《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集1，頁98-113。
- 87 〈二十世紀之中國〉，原刊《國民報》，期1（1901年5月10日），收入《國民報彙編》，頁32；羅家倫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8年，影印初版）；至於《國民報》期1之出版時間，依據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彙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次印刷），冊2，頁131。
- 88 參見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

(1879-1942) 以白話文寫作，向一般民眾宣傳中國處於被「當作切瓜一般，你一塊，我一塊，大家分分」的局面。<sup>89</sup> 陳天華 (1875-1905) 的《警世鐘》(1903 年間世) 則是以彈詞體裁灑下「革命火種」的創作，生動地呼喊：「真呀！真呀！真呀！中國要瓜分了」的場景。<sup>90</sup> 「瓜分」一詞，始終使用不絕，下逮 1924 年國民黨發布〈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仍謂在「辛亥革命」以前，推動「民族主義之運動，其作用在脫離滿洲之宰制政策與列強之瓜分政策」。<sup>91</sup>

各方論者對中國處於被「瓜分」的危機，固然念茲在茲，中國未被「瓜分」以致國亡種滅，卻也是事實。相較之下，「殖民地」這等來自東洋的新名詞，所可表述生產的意義，不僅是某種現象而已（如「聖土奴民噉」是法國之「殖民地」、吳遂稱湖南殖民地焉），更帶著激情地打開了省思國族命運的思想空間。在不同的文化語言交流過程裡，一旦歷經「跨語際實踐」(translingual practice) 的漫長過程，<sup>93</sup> 來自異文化（如廣義的西方）<sup>94</sup> 的簇新的詞彙概念進入之後，總會引發思想文化的轉折可能。對 1890 年代以後的中國人而言，如果想要表達對於外在世界之認知，諸如「殖民」與「殖民地」這等詞彙建構的概念圖象，無疑正可提升了人們的概括能力，用以指稱那些受到西方諸「帝國主義」國家統治本國以外的地區，或是敘述西方諸「帝國主義」國家在本國領土範圍以外的區域進行擴張或統治的行動。如《湘學新報》的「掌故書目提要」介紹劉啟彤的《英政概》這三部書，便說他的作品已經述說了英法二國的「殖民之政」。<sup>95</sup> 覆按劉啟彤的原著，他根本未曾使用「殖民」一詞；《湘學新報》卻提出如此概括之論，可想見《湘學新報》作者的認識能力。

隨著「殖民」與「殖民地」成為人們同知共曉的「規範詞彙」，深化人們的認識，將中

89 陳獨秀：〈瓜分中國〉，原刊《安徽俗話報》(1904 年 3 月 31 日)，收入任建樹、張統模、吳信忠編：《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卷 1，頁 27-29。

90 陳天華：《警世鐘》，收入劉晴波、彭國興編，饒懷民補訂：《陳天華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55。

91 國民黨於 1919 年易名為中國國民黨，除文獻篇名標題外，以下述說，逕做國民黨，不加區分。

92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1924 年 1 月 31 日)，《國全》，1：881、《孫全》，9：118。

93 「跨語際實踐」是劉禾的創獲，她認為，「由於中國現代的思想傳統肇始於翻譯、改寫、挪用以及其他與西方相關的跨語際實踐，所以，不可避免的是，這種研究會以翻譯作為其出發點」，在她看來，「研究跨語際的實踐見識就是考察新的詞語、意義、話語以及表述的模式，由於或儘管主方語言 (the host language) 與客方語言 (the guest language) 的接觸／衝突而在主方語言中興起、流通並獲得合法性的過程。因此，當概念從客方語言走向主方語言時，意義與其說發生了『改變』(transformed)，不如說是在主方語言的本土環境裡被發明創造出來的」，參見 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5-26。

94 當然，此處所謂的西方，並不是指擁有固定與永恆本質的對象，蓋就「西方」言之，「西方」對自身的認知，在不同的脈絡和時代，亦是眾相紛呈，參見 Jacinta O'Hagan. *Conceptualizing the We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Spengler to Said*. New York: Palgrave, 2002；又如薩依德的警告：「在歐洲與美國的人類學、歷史學和文化研究的領域裡存在著這樣的一種傾向，整個世界歷史都可以被一個西方的超主體 (a kind of Western super-subject) 通覽，然而，在這些研究領域裡的歷史化取向與學科的嚴謹度，或者是棄諸不顧，或者，在這個後殖民時期，則要替那些『沒有』歷史的人民與文化重建一部歷史」(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3, p. 35)。因是，筆者對廣義的「西方」，寧取比較寬鬆的認識論立場。

95 原文是：「譯筆極簡淨。通體於國例最詳，而於商務、農事、工藝、殖民之政差略」，《湘學新報》(台北：華文書局，1966 年)，冊 3，總頁 1685-86；本文原刊《湘學新報》，冊 19 (1897 年 10 月 16 日)。

國視為遭受「殖民」的對象，中國可能會成為「殖民地」的處境，更漸次進入了中國的思想世界；人們也開始知曉，中國面臨被「瓜分」的根源，實與西方的「殖民」拓展，密切相關。如孫中山就開始展現中國會成為西方列強的「殖民之地」的認識，而如基本上由湖南留日學生創辦的《遊學譯編》<sup>97</sup>，自「都新聞」譯出〈支那滅亡之風潮〉，從「國民奴隸性質」斷言，中國乃是「四百萬英方里而曰無主家」之土地，所以依據「地球通例，殖民學公理，無人之地無主之物，人人有占領之權」，那麼中國必然成為「地球六十三國之公共殖民地」<sup>98</sup>；由「華興會」主要成員宋教仁（1882-1913）等人創辦的《二十世紀之支那》<sup>99</sup>，在敘說創辦這分刊物之旨趣的時候，則指稱必須瞭解中國在二十世紀的時候「於世界上處如何之位置」，所以從歷史角度觀察，歐洲「競爭之旋渦」已轉移於東亞，而中國「適當其衝」，成為「列強」的「殖民」對象，特別是以「甲午」（即1894年）為分界，過去「大抵皆用個人的方法及結社的方法」進行「殖民」，此後，「列強之殖民手段乃一變」，係以「國家的方法」來推動「殖民政策」，即以「征服」、「占領」、「財政權之奪取」以及「勢力範圍與保護地域」等四種手段為之，中國則都遭受飽嚙這等「殖民政策」的苦果滋味。<sup>100</sup>又如由四川留日學生創辦的《鵲聲》<sup>101</sup>，則指陳從「世界殖民史」的發展言之，「五洲雖大，天涯海角」都已經被納入「白種人之勢力範圍」，又以中國「不能組織一個新國家出來，與列強爭為雄長」，以致「白人」可以「窺伺」中國，還打算「瓜分」中國。<sup>102</sup>

96 原文是：「西洋之倡分割者曰……維持文明之福，防塞黃毒之禍，宜分割支那，隸之為列強殖民地」，〈支那保全分割合論〉（1903年9月21日），《國全》，2：56、《孫全》，1：219；按，〈支那保全分割合論〉一文，原為日文，於1901年末刊於由東京東邦協會出版的《東邦協會會報》號82，見狹間直樹著，任駿譯：〈關於孫文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論”〉，《民國檔案》，2001年期4，頁44；尚未可得見《東邦協會會報》原文。

97 關於《遊學譯編》的介紹，見胡繩武：〈遊學譯編〉，《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集1，頁225-38。

98 〈支那滅亡之風潮〉，《遊學譯編》，冊4（1903年2月12日），頁29-33；羅家倫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8年，影印初版），總頁0371-0375。

99 關於《二十世紀之支那》的介紹，參見趙金鈺：〈二十世紀之支那〉，《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集1，頁499-503。

100 原文是：「據歷史以觀支那過去，在二十世紀前，已為世界之視線所聚。蓋自歐洲勢力平均，其競爭之旋渦，不能不移於東亞，亦勢使然也，而支那適當其衝。然在甲午以前，列強於我國殖民者，大抵皆用個人的方法及結社的方法而已，而國家的方法，猶未劇烈；自甲午敗後，於是列強之殖民手段乃一變。殖民政策中，所謂國家之方法者何耶？學者大別之為四種：(1)征服，(2)占領，(3)財政權之奪取，(4)勢力範圍與保護地域是也。征服之方法，直接者雖或無其例，而間接者，則英、法吞於先，而日本於臺灣亦屬此類。至占領之方法，則德國之占領膠州首發其難，為最近世史中著名之政策。若夫財政權之奪取，實為列強普通之方法，今日正在進行中未有艾也。而勢力範圍與保護地域，尤日見推拓，我同胞當無不知之，豈俟我言哉」，衛種：〈二十世紀之支那初言〉，頁7-8（文頁），《二十世紀之支那》（1905年6月），收入羅家倫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8年，影印初版），總頁011-012。

101 關於《鵲聲》的介紹，參見劉立凱：〈鵲聲〉，《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集1，頁555-64。

102 原文是：「諸君試再一讀世界殖民史，試一披十九世紀新地圖，五洲雖大，天涯海角，尚有一片乾淨土，未入白種人之勢力範圍嗎？何況我們中國，為地球上第一大國，占亞細亞洲四分之一，世界大陸十分之一，又居溫帶之下，氣候物產，無不凌駕全球。無如中國的人，既無國家思想，又無國民能力，席最好的地理，不能組織一個新國家出來，與列強爭為雄長。那就怪不得他們白人，羨我們，妒我們，因而窺伺我們，遂謀瓜分我們」，見山河子弟：〈說鵲聲〉（1906年），收入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0年），卷2，冊上，頁564-65。

顯然，即令「瓜分」一詞使用不絕，「殖民」與「殖民地」等詞彙，從 1890 年代中期躍登中國思想界以來，實是人們思索國族命運不可或缺的「規範詞彙」，稍後更伴隨著另一個「新名詞」：「帝國主義」的創造與流行，頓時雄霸論壇，為開鑿中國國族命運之前景的思想空間，添增無數動力。

## 五、「帝國主義」與國族危機的想像

傳統漢語裡已有「帝國」此詞<sup>103</sup>；「帝國主義」則是來自日本的「新名詞」，也很快地為中國人接受，且與世界的認知，同步並行。

從世界史脈絡言之，「帝國主義」(imperialism) 一詞，是在 1890 年代征佔殖民地的討論裡，首次成為政治和新聞詞彙的一部分。同時，它也在這個時期取得其經濟義涵，而且一直保持至今。因此，這個詞彙以往所代表的政治和軍事擴張形態，對了解這個時期的帝國主義，幫助不大。皇帝和帝國當然是古老的，但是帝國主義卻相當新穎。「帝國主義」一詞 1870 年代首次進入英國政治，1870 年代晚期，它尚被視為一個新詞彙，直到 1890 年代才突然變成一般用語。及至 1900 年當知識分子開始對「帝國主義」著書立說之時，套用最早討論它的英國自由派霍布森 (John A. Hobson, 1858-1940) 的話來說，它已然「掛在每個人的嘴上，用來表示西方世界的當代政治力量最強大的運動」。簡言之，它是為了描述一個全新現象而設計的全新詞彙。就日本的情況而言，約略在 1890 年代末期，論者已經使用「帝國主義」一詞<sup>104</sup>，隨後即有如幸德秋水 (1885-1923) 推出了《廿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1901 年初版) 提出批判，比霍布森的名著《帝國主義》(Imperialism; 1902 年初版) 還要早一年，意義深遠。取材自日文的諸種漢譯著作以及各式各樣的刊物，讓「帝國主義」一詞透過日本這條渠道，迅速進入中國思想言論界，流傳廣泛<sup>105</sup>。

各等刊物關於「帝國主義」的述說，多樣難盡。目前所知，「帝國主義」一詞最早於

103 筆者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檢查《二十五史》與《十三經》，以「帝國」進行檢索，結果如下：《新校本舊唐書》卷 3：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五月庚子「右衛率長史王玄策擊帝那伏帝國九，大破之」（餘不詳舉）。沈國威指出，「帝國」為首見於《日本書目志》的日本新詞（沈國威：〈康有為及其『日本書目志』〉，頁 60、61），應為誤論。

104 Eric J. Hobsbawm. *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7, p. 60。

105 「帝國主義」在日本的詞彙形成史，尚未可得悉；井上清指出，發行於新潟市，由帶有「國粹主義」傾向之編者主編的《東北日報》，自 1899 年 2 月 26 日起，分成十三次，發表了以〈帝國主義〉為題的論說，反對日本追隨歐美之腳步追求「帝國主義」；同時期鼓吹「帝國主義」者則亦雄踞論壇，如高山樗牛 (1871-1902) 在《太陽》發表一系列述說「帝國主義」論文（如〈帝國主義と殖民〉、〈帝國主義と帝國日本〉，分別刊布於《太陽》1899 年 3 月及 7 月），可以認為是日本早期使用「帝國主義」一詞的例證，合而觀之，高山樗牛與德富蘇峰 (1863-1957)、浮田和民 (1860-1946) 更可以說是日本帝國主義成立期的三大宣傳家，共構為日本帝國主義意識形態，見井上清：《日本帝國主義的形成》（東京：岩波書店，1968 年），頁 18-20、154-68、176-77。

106 井口和起：〈幸德秋水『廿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について〉，收入氏著：《日本帝國主義的形成と東アジア》（東京：名著刊行會，2000 年），頁 187；其餘關於幸德秋水之研究，不勝枚舉，不詳徵引。

107 全面清理「帝國主義」在 1900 至 1910 年代的各種刊物上的相關述說，整理與「帝國主義」相關而取材自日文的諸種漢譯著作，自非本文可為，以下述說，僅可略示一二。

1899年出現在梁啟超主持的《清議報》上述說「極東之新木愛羅主義」<sup>108</sup>的文章，其文略曰，自從美國取菲律賓為殖民地後，美國某參議員對條約表示意見，認為「英、美二國操持世界共通之新帝國主義」，已包括「矮機羅煞利之平和公義」<sup>109</sup>，從此「自主法制，以代古羅馬帝國主義」<sup>110</sup>。此後的《清議報》，即屢屢刊出以「帝國主義」為篇名之文章，如自《國民新聞》取材，述說「自國家之利害禍福，及人類進化之大局而觀」，「帝國主義」實是「嚴明重大之一事」，並介紹了各國推動「帝國主義」的策略和歷史，得出「帝國主義者，於內則固國家之根本，於外則如大木之擴其枝葉，固國基，張國威」的結論<sup>111</sup>。其他論者對於「帝國主義」的意涵，也頗有追索，如馮自由等人借用《清議報》為發行與印刷機關，於1900年在日本橫濱創辦《開智錄》，亦於翌年出版的第二期刊布了由馮斯樂（生卒年不詳）以「自強」<sup>112</sup>為名撰述的〈論帝國主義之發達及廿世紀世界之前途〉<sup>113</sup>，便對「帝國主義」之意義，進行了「說文解字」的工程。馮斯樂明確指出，“imperialism”的漢譯是「帝國主義」，其原來意義是「拿破崙黨」想要「恢復帝政」的「主義」，這才是真正的「帝國主義」之意義；然而，「今日之所謂帝國主義」，像是「北亞美利加洲所行之帝國主義」，其實是「膨脹主義也，擴張版圖主義也，侵略主義也」，猶如「英國古來之大強盜」所謂「狄塔偏」者所為之一般，因此，「今世界之帝國主義，實狄塔偏 Dick Turpin 主義，即強盜主義也」。馮斯樂也解釋了「物理學之發明」、「人種之膨脹」、「強弱之不齊」與「列強革命之後」是造成「帝國主義」之所以「發達」的四大原因<sup>114</sup>。刊布於《新民叢報》述說「世界經濟競爭之大勢」的文章，既申論「帝國主義之由來」，也同樣指陳「帝國主義，質言之，則強盜主義也」，而中國則正是「帝國主義之目的物」，也是「列國經濟競爭之中心點」，以致於中國恐將「亡于列強共同之經濟侵略之手矣」<sup>115</sup>。

108 所謂「木愛羅主義」，即美國總統門羅（James Monroe, 1758-1831）於1823年提出的「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

109 至於「矮機羅煞利之平和公義」為何義，尚不詳。

110 原文是：「極東之新木愛羅主義者，美國元老院議員某氏，傳之於其太啞拉摩報館也。其說曰：考之文明與人道，可知美國所領比臘賓群島，其立約所附五款。議曰：舉用此議，使英、美二國操持世界共通之新帝國主義，包含矮機羅煞利之平和公義，自主法制，以代古羅馬帝國主義也」，見片岡鶴雄譯：〈極東之新木愛羅主義〉（外國近事及外議），《清議報》，冊2（1899年1月2日），頁21（總頁冊1，頁107）；香港中國語文學會統籌：《近現代漢語新詞源詞典》指稱，「帝國主義」首見於這一期的《清議報》（頁52）。

111 〈帝國主義（譯國民新聞）〉，《清議報》，冊97-100（1901年11月11日-12月1日；引文見《清議報》，景本冊6，總頁6037、6404）；至於《國民新聞》之原文，尚待檢查。

112 關於《開智錄》的介紹，見金沖及：〈開智錄〉，《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集1，頁86-89。

113 「自強」為馮斯樂，見馮自由：《鄭貫公事略》，《革命逸史》，集1（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台1版），頁126。

114 原文是：「帝國主義（Imperialism）之名。何自昉乎？乃起於當時拿破崙黨之欲謀恢復帝政，故稱其主義為 imperialism (=Opinion des imperialistes)，此真帝國主義也，至今日之所謂帝國主義，實大有不同，如北亞美利加洲所行之帝國主義，乃膨脹主義也，擴張版圖主義也，侵略主義也。總言之，今世界之帝國主義，實狄塔偏 Dick Turpin 主義。即強盜主義也。狄塔偏生在十八世紀前半期，乃英國古來之大強盜，如我國所謂盜跖之類。今日之世界是帝國主義最盛而自由敗滅之時代也」，自強，〈論帝國主義之發達及廿世紀世界之前途〉，《開智錄》，改良期2（橫濱：1901年1月5日），頁1A-3A（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藏景本）。

115 雨塵子：〈論世界經濟競爭之大勢〉，《新民叢報》，號11（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初一日〔1902年7月5日〕）。

就取材自日文的諸種漢譯著作言，像是在 1900 年代開始蓄勢待發，將執中國出版界之牛耳的上海商務印書館，即出版了浮田和民（1860-1946）的《帝國主義》，由「出洋學生編輯所」翻譯，其內容「所論以鐵道、商業、殖民各政略為帝國主義者所操縱，歸重於德、俄二國。柄國者，宜防其擴大也」<sup>116</sup>，是書為《帝國叢書》之一部，<sup>117</sup>可想見出版者之意趣，與時代思潮合拍。幸德秋水的《廿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亦於 1902 年由趙必振（生卒年不詳）<sup>118</sup>翻譯為《二十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出版。<sup>119</sup>至於一般述說相關歷史政治的翻譯著作，涉及「帝國主義」者，不勝枚舉。通雅書局出版介紹美國總統麥金萊（William McKinley, 1843-1901；1897-1901 擔任總統）生平的作品：《麥荊來》，原著者為根岸磐井（生卒年不詳），由張冠瀛（生卒年不詳）翻譯，便述說「麥荊來」如何「以帝國主義為政策，遂敗西班牙，收取非獵賓、古巴等地」，是書「復以日、美相比較，以證帝國主義之發達」<sup>120</sup>。可以說，足可輸入「帝國主義」相關認知的書冊，實在琳瑯滿目。

當時的論壇上，更出現「民族帝國主義」一詞，指稱以「民族主義」為基礎的「帝國主義」。一時之間，此詞不脛而走。用曾倡言這個詞彙的梁啟超的話來說，「民族帝國主義」乃是一種「全盛於二十世紀，而其萌達也在十九世紀之下半」的「新帝國主義」：

十九世紀之帝國主義與十八世紀前之帝國主義，其外形雖混似，其實質則大殊。何也？昔之政府，以一君主為主體，故其帝國者，獨夫帝國也；今之政府，以全國民為主體，故其帝國者，民族帝國也。凡國而未經過民族主義之階級者，不得謂之為國。譬諸人然，民族主義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由民族主義而變為民族帝國主義，則成人以後謀生建業所當有事也。<sup>121</sup>

日]]，頁 57、《新民叢報》，號 14（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1902 年 8 月 18 日〕），頁 46-47。

- 116 顧燮光輯：《譯書經眼錄》，收入《近代譯書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年），頁 459；浮田和民的這部《帝國主義》之原著，尚待檢查；據說浮田和民的《帝國主義》一書，另有「出洋學生編輯所」翻譯的 1895 年版本（見張靜廬輯註：《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57 年〕，頁 174）；惟史扶鄰（Harold Z. Schiffrin）指出，浮田和民未有題名為《帝國主義》的著作，Harold Z. Schiffrin.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p. 283-84。
- 117 據顧燮光《譯書經眼錄》，上海商務印書館的這套《帝國叢書》，除了浮田和民的《帝國主義》以外，至少收有以下諸書：《埃及近世史》一卷，日本柴四郎著，麥鼎華譯（另有廣智書局本；《近代譯書目》，頁 425）、《中國現勢論》一卷，法國不詳人士著，日本中國調查會譯，留學生重譯（《近代譯書目》，頁 594）。
- 118 生平略見陳漢才：《康門弟子述略》（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年），頁 159。
- 119 張靜廬輯註：《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57 年），頁 174。
- 120 原文是：「《麥荊來》三卷。通雅書局《新史學叢書》第二編。洋裝本一冊，一名《米利堅近世史》。日本根岸磐井著，張冠瀛譯。美自麥荊來氏以帝國主義為政策遂敗西班牙，收取非獵賓、古巴等地，而孟祿保守之主義替矣。是書分上中下三編，編各為章，記麥氏之生平及內治、外交政策，至為詳晰。下編間記羅斯福氏歷史政策，以明麥氏繼起得人，死可不朽。復以日、美相比較，以證帝國主義之發達。作者於政治、經濟兩界皆有所心得，藉麥氏以發之其文筆，夾敘夾寫，尤能深中肯綮。譯筆足以達之，故能一洗翳障」。顧燮光輯：《譯書經眼錄》，《近代譯書目》，頁 434；至於根岸磐井這部《麥荊來》之原著，尚待檢查。
- 121 任公：〈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清議報》，冊 95（1901 年 10 月 22 日），景本冊 6，總頁 5905-11；當然梁啟超之論「民族帝國主義」，與明治時期的日本思想界息息相關，本文不詳論，參見石川禎浩：〈梁啟超と文明の視座〉，收入狹間直樹編：《共同研究 梁啟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東

倡言申論「民族帝國主義」的著作，在文化出版市場上也不乏見。如由康有為、梁啟超一系人士於 1901 年末在上海創立的廣智書局，是他們重要的事業機構之一，就出版了美國「靈綬」原著，羅普（生卒年不詳）翻譯的《十九世紀末世界之政治》，即為「專論近世各國形勢及關係中國之處，而以民族帝國主義發明之」的著作。陳天華的另一部鼓動革命風潮的名著《猛回頭》，也聲言「民族帝國主義」乃是當下「滅國的名詞」，而且「那西洋人滅人國的法子，那一條沒有向中國用過呢？就使不瓜分我們中國，但如此行去，不上百年，我們中國也沒有種了」<sup>125</sup>。

就歷史的脈絡而言，「西潮東漸」引起的世局變化，中國思想界早有多重反應，官僚士紳屢屢以諸若「奇變」、「世變」、「大變」、「奇局」、「變局」、「創局」等等詞彙抒發他們的認知<sup>126</sup>。自從「帝國主義」一詞傳入以來，遂可概括一切，眾說紛紜。在 1900 年的各等論說裡，無論是「帝國主義」或是「民族帝國主義」的浪潮，好像已若驚濤裂岸衝擊而來，更引發中國國族的空前危機，讓論者憂心忡忡，各種思考和行動，頻頻出現。如晚清「國粹派」要角之一的鄧實（1877-1951）<sup>127</sup>，述說「二十世紀初期之世界」乃是「帝國主義橫風逆潮鎖波蕩之世界」，特別是「帝國主義」之「膨脹」，已經「由歐美而近東而遠東」，所以「我老大之中國為其舞台之中心點」，因此「非競爭何以圖存，非進取無以保守，非以我國之民族主義之雄風盛潮」，否則「必不能抗其民族帝國主義之橫風逆潮」<sup>128</sup>。楊毓麟（1872-1911）以「湖南

京：みすず書房，1999 年），頁 120-22。

122 張朋園：〈廣智書局（1901-1915）——維新派文化事業機構之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台北：1971 年 6 月），頁 397-415。

123 生平略見陳漢才：《康門弟子述略》，頁 138-39。

124 原文是：「《十九世紀末世界之政治》一卷。上海廣智書局本一冊。美靈綬著，羅普譯。凡五編。一曰民族帝國主義，二曰中國開放門戶，三曰中國有關於地球全局，四曰德國之帝國政略，五曰美之於東方局面。全書專論近世各國形勢及關係中國之處，而以民族帝國主義發明之。其言中國民質原美，導之得人，足為世界實業之中心；而商人崇尚信義，尤足欽佩西人，未可遽以激烈手段處之，所言尤有至理」，顧燮光輯：《譯書經眼錄》，《近代譯書目》，頁 460；至於靈綬其人及其原著，應為 Paul Samuel Reinsch 著，高田早苗譯：《レイニッシュ氏十九世紀末世界之政治》（東京：東京專門學校出版部，1900-1901 年），相關述說，參見鄭匡民：《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年），頁 182-87（不過，鄭匡民並未言及羅普之漢譯本的情況）。

125 陳天華：《猛回頭》，《陳天華集》，頁 33-34。

126 參見王爾敏：〈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應變之自覺〉，收入氏著：《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台北：華世出版社，1977 年），頁 381-439。

127 關於鄧實的研究，可以參見李占領：〈辛亥革命時期的鄧實及其中西文化觀〉，《歷史檔案》，1995 年期 3，頁 111-16（餘例不詳舉）。

128 原文是：「今日二十世紀初期之世界，何世界乎？一橫風逆潮鎖波蕩之世界也……夫其膨脹之近由歐美而近東而遠東。吁嗟，我老大之中國為其舞台之中心點。俄人侵佔滿洲矣，英人勢力範圍揚子江流域矣，德人經營山東矣，法人窺伺兩廣矣，皆挾其帝國主義之政策以集注於一隅，……我國處此劇場，非競爭何以圖存，非進取無以保守，非以我國之民族主義之雄風盛潮，必不能抗其民族帝國主義之橫風逆潮也」，鄧實：〈通論四·帝國主義〉，《政治通論外篇》，卷一，頁 9A-9B，收入鄧實輯：《光緒壬寅（廿八年）政藝叢書》，《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輯 27（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 年），總號 267，總頁 113-14；按，本文原刊：《政藝通報》，「壬寅第五期」（光緒二十八年四月初一日〔1902 年 5 月 8 日〕），據：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彙錄》，冊 2，頁 479。

之湖南人」為名於1902年冬出版於東京的《新湖南》<sup>129</sup>，則更明確論證「帝國主義」推動的「殖民政略」，使中國陷入空前危機。楊毓麟指出，「帝國主義」的「原動力」是「國民生殖蕃盛之力之所膨脹」以及「國民工商業發達、資本充實之所膨脹」，因此「歐美各國」以之做為「對付亞東之政策」，讓「東亞」竟成為「二十世紀工商業競爭之中心點」，中國尤為其鵠的，俄國、英國、德國和美國等「帝國主義」勢力紛紛攫取中國的土地或利權，而且這些「列強」國家「施行此帝國主義之方針」相當完備，「以殖民政略為主腦，而以租界政略、鐵道政略、礦產政略、傳教政略、工商政略為眉目，用以組織此殖民政略，使達於周密完全之地」，一切做為，終使中國之「國民則如中蠱毒，臟腑蝕盡，終必死亡；如遇鬼妻，精髓日枯，立見僵踣」<sup>130</sup>。又如由湖北留日學生創辦的《湖北學生界》<sup>131</sup>，刊有暢言中國前途所在以及述說國民應盡之責任的論著，指陳在「歐洲各國由民族主義進而為民族帝國主義」的階段之後，「各國挾此主義，如貪狼惡虎四出搜索，不顧天理，不依公法，而惟以強權競爭為獨一無二之目的」，由於中國「其氣候適，其土地廣，其物產饒，其人民無發達天府富源之才力，無愛國愛種之熱誠」，以致於中國既成為「世界競爭之中心點」，也成為「白人演帝國主義活劇之大舞臺也」<sup>132</sup>。由日本東京浙江同鄉會創辦的《浙江潮》<sup>133</sup>，則論說以「民族主義為其父，而經濟膨脹之風潮則其母」的「帝國主義」乃是「世界今日之大勢」，「無論天之涯地之角，有一事之起，則無不是帝國主義者為之根」。因為中國「其土廣，其產富，其氣候適天下之可愛者未有如中國者也」，因此，「中國者，帝國主義之目的物也」，是「鷹瞵虎視之十數強國」<sup>134</sup>想要「私之蹠中」的對象。「帝國主義」在中國思想言論界廣泛流傳，中國被描述為「帝國主義之目的物」，國族命運危在旦夕，前景勢若累卵，是以「帝國主義」好似中國國族的「共同敵人」。如章太炎（1868-1936）更與亞洲諸國志士同結合，宣誓要共同「反對帝國主義而自保其邦族」，建立了以「反抗帝國主義，期使亞洲已失主權之民族，各得獨立」為宗旨的「亞洲和親會」<sup>135</sup>，它的活動，意義深長，應使參與者可以發現並營構出一部文化共享

129 《新湖南》的出版時間，據饒懷民：〈楊毓麟與辛亥革命〉，《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2年05期（2002年9月），頁73。

130 楊毓麟：《新湖南》，收入饒懷民編：《楊毓麟集》（長沙：岳麓書社，2001年），頁41-44。

131 關於《湖北學生界》的介紹，見陳大可：〈湖北學生界〉，《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集1，頁239-58。

132 原文是：「今日之時，何時乎？我中國固世界競爭之中心點也。十九世紀歐洲各國由民族主義進而為民族帝國主義。帝國主義者何？即曰：『野蠻人無開發土地富源之能力，文明人必代為開拓之』。又曰：『優等人種虐待劣等人種為人道之當然者』是也。各國挾此主義，如貪狼惡虎，四出搜索，不顧天理，不依公法，而惟以強權競爭為獨一無二之目的，殺人如草不聞聲，此帝國主義之真本領也。……世界者，白哲人種之所專有，此固白人之常言，而如錦如荼之五洲，只剩此喜馬拉亞東麓之一塊土。其氣候適，其土地廣，其物產饒，其人民無發達天府富源之才力，無愛國愛種之熱誠，此殆天所以待白人演帝國主義活劇之大舞臺也。於是，鷹瞵虎視之十數強國，風發潮湧，咸抱此高掌遠矚之政策，橫渡太平洋而東，以向我老大病夫帝國，其欲取此無主權之物，而私之蹠中也久矣」，〈論中國之前途及國民應盡之責任〉，《湖北學生界》，期3（1903年3月29日），頁1-2；羅家倫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8年，影印初版），總頁0319-0320。

133 關於《浙江潮》的介紹，見丘權政：〈浙江潮〉，《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集1，頁269-87。

134 〈社說·國魂篇〉，《浙江潮》，期1（癸卯正月二十日〔1903年2月17日〕），頁13-15；本文引用的版本是羅家倫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8年，影印初版）。

135 章太炎：〈亞洲和親會約章〉（1907年），收入朱維錚、姜義華編注：《章太炎選集（注釋本）》（上海：

的歷史 (a history of cultural sharing)，或可視為建立區域政治聯帶關係的前提，也為「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首開時代之新聲。<sup>136</sup>

可以說，「帝國主義」一詞在 1900 年代初期風行於中國思想界以來，它也成為另一個「規範詞彙」，其義涵更是眾知共曉，讓論者可以在提出論說或是針砭時事的時候，引以為喻。像孫中山自身在 1904 年聯合美國的華人秘密會黨以為革命之助時，就強調當下處於「爭競生存之時代」，特別是「天下列強高倡帝國主義，莫不以開疆闢土為心」，以致「五洲土地已盡為白種所併吞」；即令日本與中國尚倖免此劫，但是，滿清政府連「祖宗發祥之地，陵寢所在之鄉猶不能自保」，自然更不能「長有我中國」<sup>138</sup>，藉以證成排滿革命之必要性。<sup>139</sup>又如《時報》的論客則論說曰，當時中國政界「上而宮廷，中而執政，下而群士百寮，其行事之間，出言之頃，隱若有一南北之見，互於其中」，實為不當，因為「今日之世界，實帝國主義盛行之世也」，所以當「今日帝國主義之政略，若是其劇烈也。而當其鋒者，又莫如我中國」，如果中國猶「自相分裂，以渙散應之」，如何能夠「謀拒他人之帝國主義」。<sup>140</sup>

從此，「帝國主義」一詞就像是一個概念的萬寶盒，可以收納西方國家從十九世界以後對中國在政治、經濟、社會乃至於文化、教育領域的一切做為，讓人們概括西方侵略中國的歷史時，可以信手捻來，如胡漢民（1879-1936）在 1925 年寫就的《自傳》回顧自己經歷過的時代變局，就指稱：

滿清末葉，重以帝國主義之侵掠，民生日蹙，清廷政治，惟有黑暗腐敗，滿族尚武之精神已衰，日趨於統治貴族坐致滅亡之末運。於是漢民族思想日盛，以至於傾覆滿洲。<sup>141</sup>

他也將「義和團事件」與倡言「排滿革命」的「動機」根源，解釋為是「抵抗帝國主義之壓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頁 427-31。

136 這是 Rebecca E. Karl 的詮釋，參見 Rebecca E. Karl, *Staging the World: Chinese Nation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70。

137 參見王祿斌：〈孫中山與美國僑領黃三德：兼評黃撰《洪門革命史》〉，收入陳勝彝主編：《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史研究：慶賀陳錫祺先生九十華誕論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370-72。

138 原文是「當今為爭競生存之時代，天下列強高倡帝國主義，莫不以開疆闢土為心；五洲土地已盡為白種所併吞，今所存者，僅亞東之日本與清國耳。而清國則世人已目之為病夫矣，其國勢積弱，疆宇日蹙，今滿洲為其祖宗發祥之地，陵寢所在之鄉猶不能自保，而謂其能長有我中國乎？此必無之理也」，〈重訂致公堂新章要義〉（1904 年陰曆正月），《國全》，2：886、〈致公堂重訂新章要義〉（1905 年 2 月 4 日），《孫全》，1：260；按，孫中山推動致公堂註冊改組，事在 1904 年（《國譜》，頁 239-40、《孫譜》，頁 312-13），故本文繫年以 1904 年為宜。

139 這是孫中山首度使用漢語「帝國主義」一詞的場合（參見呂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對新思潮的回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 年〕，頁 134）；不過，孫中山在這分〈重訂致公堂新章要義〉裡僅強調要「先清內奸而後除異種」，前者指「殘同胞而媚異種」的「漢奸」，後者自是「滿清」，並未將「帝國主義」視為革命的對象。

140 〈論南北成見之所起〉，《東方雜誌》，第 1 年第 10 期（光緒三十年十月二十五日〔1904 年 12 月 1 日〕），頁 233-41（景本冊 4，頁 2271-79）；按，原文註記：「錄七月三十日至八月初六日《時報》」。

141 胡漢民：〈自傳〉（1925 年），收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胡漢民先生文集》（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78 年），冊 2，頁 4。

迫而起」；<sup>142</sup>像胡漢民一樣以「抵抗帝國主義」來詮釋「義和團事件」的思路，則不絕如縷，蔚為大觀。<sup>143</sup>就像「現代化」一詞可以是書寫近代中國歷史變遷的「敘述實體」(narrative substance)一般，<sup>144</sup>「帝國主義」一詞也有同樣的作用，足可將近代中國千樣萬態的歷史事件串聯起來，生產它們的總體意義。

總結言之，自從「帝國主義」一詞在 1900 年代在中國思想言論界創生以來，它勾勒總攝西方國家對中國的一切行動，是無所不包的概念範疇，激發了國族危機的想像動力；「帝國主義」做為一個「規範詞彙」，它的義涵毋需界定，不言自明，已然形成時代共識與共同語言。

## 六、「規範詞彙」與「認知地圖」的重新繪製——「新名詞」與「關鍵詞」的意義

在傳統中國的思想架構裡，中國處於所謂「世界秩序」的核心地位。這樣的觀點，不過是個被建構出來的「神話」<sup>145</sup>。惟則，在中國被迫和西方國家開始密切互動的十九世紀，支配人心的則是這樣的觀念和過往與「蠻狄」交往的「歷史經驗」。隨著中國士人逐漸瞭解世界局勢，逐漸知道中國不過也只是世界諸多國家之一，並不特居優越地位；中國固然物盛地廣，「蠻夷之邦」卻同樣是也花花世界（甚至繁庶廣博，猶而過己）。對於外在大千世界的存在的認知，對其面貌的瞭解，讓中國人在因應世局的變易之際，添加了許多豐富的「思想資源」，導生的結果，相當多樣，<sup>146</sup>對於「世界秩序」的認識理解，更是展現劇烈的變化，被迫在另開新面的「世界秩序」架構之下找尋和建構自我定位，重行繪製一張簇新的「認知地圖」(cognitive map)<sup>147</sup>。「殖民」、「殖民地」和「帝國主義」這幾個「新名詞」，自從在 1890 年代中期誕生以降，為理解「世界秩序」的變化趨勢，思考自身國族定位，打開了寬闊的思想空間，可以說是幫助中國知識人在「認知地圖」上定位歸向的「規範詞彙」。

142 原文是：「排外為義和團事件之總動機，為帝國主義壓迫之反響。其在農民份子，此種民族思想之表現，於革命歷史進行中有莫大價值，決不因後來帝國主義者之污衊詬罵，而有所貶損。……當時有「南革北團」之稱，革命黨以排滿革命為口號；義和團則以扶清滅洋為口號，其目的絕對不同。革命為解放改造之思想；義和團則惟是野蠻復古之思想；二者更難相提並論。然皆以抵抗帝國主義之壓迫而起，其動機實如一耳」，胡漢民，〈自傳〉，《胡漢民先生文集》，冊 2，頁 6-8。

143 參見 Paul A. Cohen.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Chapter 8, "Anti-Imperialism and the Recasting of the Boxer Myth" (pp. 238-60)。

144 參見潘光哲：〈想像「現代化」：一九三〇年代中國思想界的一個解剖〉，《新史學》，卷 16 期 1（台北：2005 年 3 月），頁 85-124。

145 楊聯陞：〈從歷史看中國的世界秩序〉，收入氏著：《國史探微》（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 年），頁 1-19。

146 郝延平、王爾敏：〈中國中西觀念之演變，1840-1895〉，收入費正清、劉廣京主編，張玉法主譯：《劍橋中國史·晚清篇》（台北：南天書局，1987 年），下冊，頁 153-216；王爾敏：〈十九世紀中國士大夫對中西觀念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觀念〉，收入氏著：《中國近代思想史論》，頁 1-94；鍾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不詳舉。

147 參見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收入氏著：《時代的探索》（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 年），頁 51-52。

「殖民」、「殖民地」和「帝國主義」這些詞彙在中國思想言論界廣播遠傳，使用廣泛，改變了中國知識人對「世界秩序」的認知，必須重行開展自我定位的建構工程。中國知識人知曉，中國不再是泱泱大國，反而是被「殖民」的對象，進而更可能會成為「殖民地」；稍後，隨著「帝國主義」一詞進入了思想言論界，中國將成為「帝國主義之目的物」的述說曲調，也傳唱不已，普遍認為中國國族面臨空前的危機，恐將瀕臨國亡種滅的結局。因此，就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脈絡來說，一旦國族被抬舉到至上至尊的地位，「殖民」、「殖民地」和「帝國主義」這些「規範詞彙」，既然是導致中國國族的危機根源，它們在「認知地圖」上就承載了負面的意義；<sup>148</sup>在此後的思想言論界裡，這等負面的意義，並以更精緻的方式被持續建構，始終延續不絕，並且成為此後思想語言世界裡不可或缺的「關鍵詞」：孫中山創造「次殖民地」這個「新名詞」，毋寧正是長遠歷史脈絡的產物。

整體言之，孫中山創造的「次殖民地」，脫胎於「殖民」這個約略於 1890 年代中期在漢語世界裡問世的「新名詞」，同時再衍生轉變為「殖民地」；「殖民」與「殖民地」這兩個「新名詞」並迅速成為人們同識共曉的「規範詞彙」，廣受應用，也提供了思想變遷的動力，讓中國的自我認知，別開新局，為人們思索中國國族的命運，打開了寬廣的思想空間。在 1900 年代初期，「帝國主義」這個「新名詞」開始風行於中國思想界，它也成為另一個「規範詞彙」，並與「殖民」、「殖民地」相結合，改變了中國知識人對「世界秩序」的認知，也導致自我定位的建構工程的重行開展。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隨著馬克思主義在 1910 年代中期重行傳入，「殖民地」和「帝國主義」這些「規範詞彙」的意義內容，另現新象，明確地以馬克思主義式的帝國主義理論為判準，尤其是列寧提出的「半殖民地」一詞，非僅躍居「規範詞彙」的地位，更被轉化為「半殖民地想像」論述，成為發動革命的思想動力。孫中山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思想脈絡裡，提出「次殖民地」這個「新名詞」，創造出「次殖民地想像」論述，並有意與「半殖民地想像」爭奪「意識形態霸權」，做為革命的指導方針。

透過清理「殖民」/「殖民地」這等「新名詞」的歷史形成過程，正可以具體展現，在當下的漢語世界裡，諸如「殖民」/「殖民地」與「帝國主義」儼然既是不可或缺的「規範詞彙」，它們的意涵內容，好似不證自明；同時，它們也像是具有「關鍵詞」意義/地位的詞彙，沒有了這些詞彙，人們沒有辦法詮釋與理解世界的意義。但是，它們會成為「規範詞彙」與「關鍵詞」，並不是理所當然的，而是漫長的歷史過程與現實需求相互糾纏的產物。只有清理它們是在什麼樣的具體歷史脈絡裡誕生問世，才有助於我們對於這些詞彙之內容及其象徵意義的反思。

148 其實，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所謂「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等語，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支撐下，並無今日習見之貶義，如 Elie Kedourie 指出，一直要到霍布森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1902 年初版）與列寧（Vladimir Ilyich Lenin, 1870-1924）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1916 年出版）之後，我們才慢慢透過他們樹立的理論框架來了解這兩個歷史現象，此所以 Kedourie 有言曰：「我們現在都是列寧與 Hobson 的信徒」。參見 Elie Kedourie. "Introduction." *Nationalism in Asia and Africa*, pp. 3-8, 引自沈松橋：〈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頁 140（註 228）。

本文引用孫中山著作，不註出作者，簡寫如下：「文章篇名，冊數：頁數」，如：〈學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1923年12月21日在廣州嶺南學生歡迎會演講），《國全》，2：590-91、〈在廣州嶺南學生歡迎會的演說〉（1923年12月21日），《孫全》，8：540-41，即指引自《國父全集》，第2冊，頁590-91、《孫中山全集》，第8卷，頁540-41（文章篇名相同者，不詳註出；不同者，則一一註出）；至於本文引用的版本是：

簡寫	原書名與出版資料
《國全》	《國父全集》，6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3年）
《國全》，補	《國父全集補編》（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5年）
《孫全》	《孫中山全集》，12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起）
《孫全》，外	陳旭麓、郝盛潮主編：《孫中山集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又，本文引用羅家倫主編，黃季陸、秦孝儀、李雲漢增訂：《國父年譜》（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年，第4次增訂本），簡寫為《國譜》，並註頁數；引用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簡寫為《孫譜》，並註頁數。

本文主題“從「新名詞」到「關鍵詞」”，曾得台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班同學韓承樺討論指教，謹此致謝。本文倉促擬就，有請高明卓參批判，並請毋徵引。本文為國科會專題計畫：《「封建」與“Feudalism”的相遇：「概念變遷」和「翻譯政治」的歷史考察（I）》補助成果（計畫編號：94-2411-H-001-061），謹此特致謝忱。